

历年的两会总理记者会是中外信息交流和价值观碰撞的一个特殊

场合，近年来它的官民沟通效应进一步放大。中国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外国人的“第三只眼”会围绕这个问题提供什么额外的维度，北京如何统筹内外的各种关切，看了总理记者会，人们会得到一个大的轮廓。

今年的李克强总理记者会给人一个突出印象，那就是中外记者问经济和民生的特别多。记者们一共提问了19次，其中直接针对国内经济和民生的是12个问题，如果加上涉及对外贸易的，就是15个问题。一个政府如果把经济和民生搞好了，是不是就完成了它的使命的15/19呢？这个比例也许真差不多。

我们生活在公众意见深刻影响国家政治面貌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点一定是经济和民生会成为它最持久的主题，因为老百姓最关心过好日子。当然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好日子”的标准会起变化，比如环保因素强劲地加入进来。

总理记者会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的自信，既有对6.5%左右这个数字含义的自信，也有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所未有。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每年的GDP实增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它一年支持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这个数字也很令欧美眼晕。西方经济学没有过这样的记忆，也没有衡量它代表了什么尺度。

所以办成这件事很不容易。中国这几年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排浪，但紧跟着就是从经济旧动力到新动力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十八大以来达到改革开放后的新高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勇敢、稳健地开展了这一轮历史性调整，中国政府操控“超大工程”的能力得到最高级别的发挥。中国无论多么问题成堆，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姿态确实很牛，把不断高唱或者暗示中国“行将崩溃”的那些人简直气死了，急死了。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展现了充分

“双创”持久不衰的自信，更包括中国政府驾驭复杂国际问题的自信。李总理坦言了在深化改革中推动简政放权等方面的难点，能这样把问题和盘托出，讲述政府“刀刃向内”的必要性，这也是对整个国家已经适应改革大节奏的自信。

这些年新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是核心，但活跃的舆论却经常走神，形成新时代的特殊干扰。这些年互联网舆论场上对国家经济实情的认识有不少时候走偏了，具体问题常常被放大到全局层次，总是吓唬老百姓。自信是一个社会的重要品格，但互联网却似乎在展示“自嘲”竞赛。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可以说被西方舆论骂了这一路。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应该说还是强大了许多。我们骂不过人家，那就让我们干得更好一些吧。总理记者会说的都是大实话，这些大实话不是房间里的花瓶和装饰画，而都是垒房子的砖块和石头。▲



实现与美国的“相互调适型”互动

吴心伯

中美领导人将于4月举行会晤的消息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事实上，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对接工作早已陆续展开。2月10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的通话交谈，标志着特朗普执政后中美高层交往正式启动。随后，双方高层官员通过会面和通话等形式开始对接。

尽管如此，双边关系具体如何展开还有待观察，我们对特朗普执政带来的挑战要有清醒认识。首先是特朗普团队的对华态度和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特朗普团队总体上在对华问题上持强硬态度，而且这种强硬态度在不同层次上覆盖了经贸、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如此，特朗普执政团队新手较多，对情况不够熟悉，喜欢不按常理出牌。对华强硬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会导致特朗普执政初期双方对接的困难，妨碍在两国外交团队间形成有效的工作模式。

其次是经贸领域的挑战。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产生广泛影响。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措施和美元加息将使美元更加强势，增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快资本从中国外流；其重振制造业政策将导致部分在华美资回流本土。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预期采取的强硬行动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并有上升为贸易战的风险。在投资方面，特朗普也可能基于所谓“互惠”原则，要求中方扩大对美资开放，并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作为杠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包括“网络商业窃密”)也可能成为特朗普在经贸方面对华施压的着力点。

最后是安全领域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信奉“以实力求和平”原则，决心加大国防投入，提升美国军事力

量，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军事优势进一步扩大，使中国在西太平洋面临来自美国更大的军事压力。同时鉴于其执政团队中鹰派军方人士较多，有可能推动美军在南海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加剧中美在南海的对抗。如果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在东海、南海等地发生危机事件，美方有可能采取强硬和激进行为，增加双方军事冲突的风险。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也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摩擦。此外，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西太平洋对中国采取离岸制衡政策，它将鼓励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对华牵制，而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也会趁机加速提升日本军事能力，强化在西太平洋制约中国的战略态势，这不仅意味着中日关系将总体上保持冷淡和僵持状态，更意味着中日之间在海上发生危机事件的风险增加。

从以往经验看，中美互动大致上有三种模式：一是相互调适型，中美以谨慎和务实的方式开展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各有主动，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推进合作，避免冲突，形成一种良性的工作模式。

二是冲突型，双方秉持并坚持推进一系列相互抵触的政策目标，不愿意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调整，或相信能够迫使对方作出妥协和调整。两国关系冲突不断，在缺乏进行良好沟通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双方的协调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冲突时的止损努力，这是一种消极的工作模式。

三是主动—被动型。强势一方主导双边关系的议程设置和交往方式，弱势一方无意愿或无能力争取平等的互动态势，而是选择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博弈来推进己方

的利益目标，且强势一方也能对弱势一方的利益予以适当照顾，两国关系能够避免大的冲突。这种工作模式下，双方有良好的沟通和稳定的互动预期，两国关系可预见性强，但缺乏平等性。

上述三种互动模式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所体现。在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应争取使“相互调适型”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特朗普执政有很多新特点，这对中方管理中美关系提出了新挑战。但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战略运筹能力。

要处理好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美关系，首先要积极研究、接触和影响对方，争取中美关系较快和较为平稳的过渡，但也要根据中美之间“不打不相识”的情况，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尚在形成中，其出发点应该不是要搞坏中美关系，而是从中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但如果美方胃口太大，或处理双边关系方式不当，中方必须坚决回击，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能够推动对方的政策调整。

在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步入正轨之后，还要注意在互动中不断引导对方。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离不开中国的经济合作，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是特朗普时期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形成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以期待的。在此过程中，中方要积极提高中美关系的品质，使双边关系发展更好地体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对日本比较了解的一些朋友注意到，最近几年日本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减少了，企业员工也不太愿意被派到海外常驻。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日本社会正在回归的“内向意识”不无关系。

作为岛国，日本的内向趋势本来就强，国内不易发生革命性改革。但通过引进外国文化或因遭受外来压力，日本也有过并不完全内向型的时期，明治时期和战后高速发展时期就是两个典型例子。

先说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明治以前日本闭关锁国200余年，国力羸弱。为推进工业化和近代化，当时的日本政府积极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和经验，推进国内改革。明治时代日本大的目标就是成为欧美那样发达的国家，民众也对自身生活改善充满期待，充满干劲。因此，直

战前采取的本国中心扩张路线，向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国际协调转向。只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为了保护国内产业，日本采取了诸如限制外资进入日本市场等内向型政策。那些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很快遭到其他国家批评，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就是例子。

结束高速增长进入稳定发展期后，日本逐渐失去目标，其结果是内向倾向更明显了。泡沫破碎后的日本经济低迷，虽然围绕如何摆脱经济困境的议论增多，但受内向思维影响，仍未能在看清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潮流的基础上，确立日本今后的明确目标。

以上两个例子的共同点是，那些时期的日本都处在追赶阶段，有必要向外国学习本国没有的技术和

日本转内向，狭隘民族主义抬头

【日】吉田阳介

到现在还有“明治时期是有活力时期”的说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冷静分析世界形势，了解本国国际地位，努力避免了内向应对方式。但随着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日本却渐渐陷入本国中心的扩张主义。一战后的世界逐渐形成“国际协调主义”潮流，日本没能看清这股潮流，未改变其帝国主义思路，走上了战争道路。某种程度上讲，内向应对是军国主义的日本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当时日本的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国内舆论的反应，没能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筹划日本的发展战略，最终滑进战争漩涡。

再看战后日本的高速发展时期。二战战败使日本国力大幅下滑，经济建设几乎“从零开始”。在美国影响下，日本以强化经济为目标，到战败10年后的1955年，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迎来高速增长。尽管经济得到恢复，但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算不上经济大国，日本制造的质量比先进国家差，国民生活水平也达不到先进国家标准。因此，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以经济达到欧美水平为目标，民众为了过上欧美那样的生活而努力工作。

在外交层面，战后日本从反省

经验，因此当然要打破内向型思维禁锢。而且，国内社会变革快速推进，日本民众也期待改革能给自身生活带来变化，因此更趋积极开放。但过了那些阶段，日本上下失去目标，就又回到了内向型。

经济不振同时又陷入内向思维，这种倾向危害极大，日本需要格外警惕。以战前为例，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受到世界恐慌的影响陷入经济低迷，失业者众，当时的日本政府没能出台有效对策。在那期间，狭隘的民族主义逐渐抬头，要当亚洲乃至世界霸主的扩张主义声音成为主流，避免战争的理性声音消失不见。

而在最近二三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取得快速发展时，“失去20年”的日本经济却持续停滞。在此期间，强调日本是亚洲大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出现了要当政治大国、变回“以前那样的日本”等声音，内向倾向不断加剧。

虽然日本是发达国家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它在亚洲乃至世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在的日本确实不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社会。如今亚洲和世界与以前情况已有不同，日本不应陷入内向思维，而是必须认清并立足于现在的位置，思考今后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作者是日本日中关系研究所研究员)